

上海工人運動

歷史資料

— 第三輯 —

內部材料
注意保密

上海工人運動史料委員會編印

一九五三年五月十五日

通 知

滬委（五二）字第一九〇號
一九五二年七月十九日

市委同意上海總工會黨組提出關於成立上海工人運動史料委員會，負責搜集上海工人運動史料的意見。爲使這一工作順利進行，特通知下列各點：

一、各區委、黨委、黨組應將是項工作視爲一項重要任務，根據七月八日上海總工會在解放日報所登之徵集啓事，領導、動員所屬工廠、商店的基層組織搜集有關工人運動、工人生活、革命鬥爭事實的各種書刊、報紙（油印、鉛印、石印或手抄等）、調查材料、信件、墨跡、日記、手稿、傳記、會議記錄、宣言、決議、決定、標語、口號、傳單、圖表、照片、印章、符號、證章、標幟、烈士遺物、遺像、遺著和武器等紀念物品，以及帝國主義、國民黨壓迫工人的反動罪證。

二、各級黨的組織應在不妨礙當前中心工作任務的原則下，通過召開老工人座談會、個別訪問等方法進行搜集工作。

三、各區委、黨委、黨組應指定專人，經常與上海工人運動史料委員會取得聯繫。

中共上海市委員會

「上海工人運動歷史資料」徵稿及發行簡則

一、本刊的出版是爲保存和積累上海工運史料，供研究上海工人運動歷史的參考。所刊文字都是資料性質，其中事實和觀點都不一定正確，因而不得轉載。

二、本刊包括下列內容：

甲、有關上海工人運動歷史的文件；

乙、某些已經絕版的、行將散失的有關上海工運的權威著作；

丙、記述上海工人運動各時期的各單位鬥爭的資料、文稿和回憶；

丁、工人運動烈士傳記。

三、希望熟悉上海工人運動歷史的同志爲本刊踴躍投稿，並酌致稿費。

四、本刊經過黨的系統發行，注意保存，不得外傳，定期收回。

目 錄

上海工人與抗戰（劉長勝，一九四四年十月）

店員與職員運動（張承宗，一九四四年十月）

漫談上海職工（永生（劉長勝），一九四六年四月）

紀念五一國際勞動節（永生（劉長勝），一九四六年四月）

五一節的兩種紀念（章 遲（張 祺），一九四七年五月）

論上海的工會組織（毛齊華，一九四七年五月）

論蔣管區職工運動新動向（劉長勝，一九四八年二月）

解放以前上海教師運動總結（初稿）（馬飛海、方 明等集體總結，一九五一年）

編 後 記

上海工人與抗戰

劉長勝

——一九四四年十月發表於「真理」十九期

上海工人在我國工人鬥爭史上曾寫下自己光輝的一頁，對中國革命所起之推動作用是人人皆知的，如一九二五年的「五卅」大罷工，一九二七年歡迎北伐軍進上海的三次武裝起義等等，誰人不曉得呢。這裏不想多講過去的一切，只談談上海工人爲抗戰而英勇鬥爭之一斑。

甲、「一九一八」以後

爲實現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的口號而奮鬥

中國工人階級在自己的政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幾十年來如一日，始終如一的爲民族解放、社會改造而英勇的鬥爭着。不管任何時候，在反帝、反封建鬥爭的實際行動中，他在全國人民面前都起着特殊的作用，他是自我犧牲的模範，不屈不撓的先鋒。這種情形尤其在深刻的民族危機面前表現得更明顯。如中國工人階級看到了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佔我東三省之事件後，莫不表示出義憤填胸、磨拳擦掌、敵愾同仇的情緒，而在全國各地羣起要求國民黨立即停止內戰，一致對外；並聲言對日寇的侵略行爲祇有抗擊，決不能妥協退讓，堅決反對國民黨的一套什麼「等候國聯調停」「睦鄰政策」「安內攘外」等等自欺欺人的鬼話。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當時駐防在上海的十九路軍，就在上海工人熱烈推動之下毅然挺身抗擊日寇。而上海工人則衝破了國民黨一切壓迫與限制，立即組織起來，放棄了工作，跑進工廠與十九路軍官兵並肩作戰。日本工廠工人組織了四萬七千多人的反日大罷工，這個上海日廠工人反日大罷工，先後堅持了三、四個月之久，驚動了國內國外的人士。而誰都知道這次大罷工的組織者及領導者，就是中國共產黨。記得那時有個蘇聯軍事家對「一二八」抗戰分析說：

「十九路軍官兵及上海工人結合起來的力量是非常雄厚的，使日寇遭到了意料不到的痛擊。而如果南京政府略加支持的話，則十九路軍與上海工人完全可能把日軍驅逐到吳淞口外，淹死在海裏。」

在這些年代中，工人運動與救國會、武裝自衛會等發生着組織上、行動上的密切關係。工人階級成了推動抗戰的主力軍。在每次抗日示威中都有成千成萬的工人參加着。最初與日本法西斯表示不共戴天而英勇鬥爭的，也正是中國的工人階級，而上海工人又始終站在最前哨。尤其當一九三二年四月十五日中華蘇維埃政府對日正式宣戰後，上海工人的抗日活動是在再接再勵、突飛猛進的發展着。

乙、抗戰的初期

(一)「八一三」的抗戰

一九三七年「七七」蘆溝橋抗戰爆發，隨着而來的是八月十三日上海的抗戰，也即是全面抗戰的開始。中國工人階級當時那種興奮、愉快、緊張的心情，實無法形容於筆墨。這時在全國各工人區域都出現着極大的變化。在上海一方面，我們看到所有的日本工廠的中國工人，莫不異口同聲一齊離開了工廠，雖然大部份距戰場還很遠；有些地方離戰場較近被日軍監視着，不準工人離開工廠一步，但他們與她們就一股勁的衝出來，堅決表示再不給日寇作工了，這就破壞了日寇在華多年來進行掠奪的、而且正在企圖利用到侵略戰爭方面去的經濟組織系統。這是打日本法西斯腳後跟的辦法，也是與當時抗戰部隊實行一種夾攻配合的行動。

另一方面，那些在中國工廠作工的男女工人，雖然已經陷於戰場四週強烈的機關槍的火力下，但他們（她們）由於被愛國心驅使着，卻鎮靜自如地極力協助愛國的軍隊進行抗戰，把工廠變成抗戰的堡壘，把工房變成前方醫院，把自己的牀鋪讓給受傷的戰士們休養。而女工們也變成了臨時的一「護士」，晝夜的看護着她們所心愛的愛國軍人。在上海周家渡一帶，日寇見到這種情形，老羞成怒，立即把一大片工廠用大砲轟毀，結果使我成千的優秀的男女工友們同受傷的愛國軍人都犧牲於日寇的砲火下。

在上海租界區的中國工人，也同樣爭先恐後的參加抗戰。如英商公共汽車公司的工友，要求廠方允許全部停止工作，使他們能到前方去為抗戰服務；廠方不肯允許，他們就不顧一切，自動的開出二十輛汽車不告而別了。出差汽車公司的工友，也曾自動的開出三十多輛汽車，晝夜不息的來往前後方。煤業工友組織了一個救護隊，並有十二輛卡車赴前方服務。後來因國民黨跑遠了，他們就到新四軍來了。電氣工友冒着砲火繼續着發電，以供給我軍用電網、電話、電報

等需要。各種工人所迅速組織起來的「戰時服務團」，正像雨後春筍。這些服務團往往在槍林彈雨中，到前綫開展宣傳、慰勞、娛樂等工作。但不久，國民黨却公開拒絕，不允許他們到前方去，因他們與戰士接近，恐怕戰士明白了抗戰的意義。他們不得已就到各醫院去慰勞傷兵，並作些看護和教育等工作。

這種服務團除了在產業工人中進行極廣泛的動員工作外，並在租界區市民中也作了相當普遍的宣傳鼓動工作，因而動員了廣大的手工業者，如皮匠、理髮匠、裁縫師傅、銀匠等等，都走出了自己的店鋪，共同去進行救亡活動。碼頭工人、黃包車夫甚至娘姨，都自願地把自己辛辛苦苦賺來的一點工資，捐給抗日事業。

上海的工人們對八路軍、新四軍更表示了無限的關心與熱愛，把它看做自己的軍隊。當八路軍在平型關勝利的消息傳到上海時，上海的工人與市民莫不眉飛色舞，歡騰不已，似過着盛大節日一樣，相信中國軍隊確實可以同日軍一戰。當時有個工人去買報紙，賣報的向他說：「今朝好消息，八路軍打了大勝仗。」說的時候並把大姆指一伸，表示是頂好的軍隊。而那位工人却回答說：「阿拉（即我，上海方言——編者註）老早曉得格。」賣報的不了解他的意思，就反駁說：「老朋友，儂勿要吹牛好哦，刻刻（即剛才，上海方言——編者註）來過消息，儂哪能老早曉得呢？」那工人說：「儂自家勿要吹牛，儂曉得啥？阿拉曉得八路軍是紅軍改編的，當然會打勝仗啦！」從這段對話中，我們可以充分看出上海的工人們是怎樣關心與熱愛人民自己的隊伍。

而另一方面，「八一三」抗戰開始時，國民黨分子曾發起組織武裝「別動隊」，成千成萬的工友也曾踴躍地去參加這支隊伍。這本是很有前途的一支生力軍，工友們一心希望能夠開赴前綫，對敵作戰；不料，國民黨這批傢伙們，又是老戲重演，他們在向上級騙取了五、六萬人的批軍餉之後，就把這個隊伍「解散」了，說的更恰當些，是又一次被騙子手出賣了。

上海工人以及廣大羣衆所積極參加的抗戰，被「應戰」的國民黨弄糟了。國民黨指揮的軍隊潰敗並逃跑，而且跑得既快又遠。不過上海的工人們卻沒有絲毫表示心慌意亂、悲觀失望的情緒；相反的，大批的技術工人毅然決然的隨着抗戰的轉移而撤退到大後方去，一心一意的爲祖國効勞去了。

（二）城市雖淪陷而愛國工作仍繼續着

上面說過，國民黨在上海「應戰」的結果，不久就垮台了。上海工人爲着加強抗戰的力量，不顧一切，就大批的離鄉背井到遙遠的後方工作了。應該指出，這批工人是最熟練的工人，是上海工人中最精銳的部份。

留在上海的工人，其處境非常困難。大部份失業工人，不得已的回了鄉，無鄉可回的就住難民所變成難民了。在業

的工人，有的處在半失業狀態中，即每月工作十天、二十天都不一定，尤其在工資方面遭到七折八扣。資本家把工人的工資打了折扣發給，有的打八折、七折、六折，而最不讲大義的資本家竟打了對折呢！這就是說工人與從前作一樣的工作，但工資只能領到一半；其餘的一半，資本家說是扣下來彌補他在上海戰爭時的損失的。資本家這種辦法，等於給工人頭上澆了一盆冷水。可是工人並不因此而對抗戰有任何鬆懈和動搖。不，他們與她們爲着表白自己對祖國的愛護與忠心，就提出「節約救難」「獻金運動」等工作。也就是說，他們雖處在淪陷區仍不氣餒，提倡大家互助；工資雖減少，反而提倡儲蓄獻金，獻給前方抗日軍隊。爲着幫助新四軍而展開的寒衣捐運動成績很好，此種運動不只在工人中普遍進行，而且推動着上層，故有上海代表團到第三戰區和新四軍中去慰勞的事情。但是後來頑固派襲擊了我新四軍，才一般的停止了這種抗日活動。

上海的國民黨，在抗戰前千方百計的壓制工人的抗日活動，抗戰開始後又作威作福的包辦工人的抗日活動，其實是包而不辦。隨着上海的淪陷，國民黨的幹部全部溜之大吉，他們在工人中活動的幹部如朱××等也跑了。國民黨把上海的人民送給了日本法西斯。可是我們黨及上海工人中的先進分子，則不顧一切艱難，號召工人繼續堅持鬥爭，上海永遠是我們中國的。工人運動深入生產，組織工人，教育工人；並以工運統一的團結原則，去治療過去國民黨統治下對工人分化政策所產生的惡果。國民黨曾故意的把工人分成男、女、熟練、不熟練、老工人、新工人、長工、臨時工等不需要的界限；我們號召工人不分彼此，以民主的方式團結起來，不管是工人任何自發組織的大小團體、黃色工會以及新的各種抗日組織等等，大家儘量作到互相尊重，親密接近，聯絡感情，徵求意見，協商問題，一致對付日寇。其次是大量的辦工人夜校，推進工人識字教育，調查研究過去工運的材料，出版刊物書籍等，以培養工人及工運幹部。

托洛斯基分子在工人中曾大造謠言，說共產黨「出賣了工人階級去與資本家合作」。他們以工人階級領袖自居，到處號召工人罷工反對資本家，反對一切帝國主義，反對共產黨員等。可是工人們比這批無恥傢伙進步得多，很容易辨認出他們的假面具、陰謀與詭計，公開唾棄他們。當托派分子不識相的繼續侮辱工人時，工人也就不客氣了，爽快的以拳頭擊之，耳光送之。

（三）勞資關係反而改善

值得一提的，是抗戰以來上海工人對民族資本家的態度非常嚴正，處處以抗戰利益爲第一，既不計較以往，又不因資本家某些新的無理行爲而衝動。雖然資本家自私自利、自作主張的把微薄的工資一再大打折扣，但工人並沒有馬上來個反擊。有些資本家一面以爲工人不辭辛苦的晝夜不停的爲着抗戰活動，顧不到資方的行爲；一面以爲工人怕日寇壓

迫，怕失業威脅而不敢表示態度。其實工人完全是爲着抗戰的大義，爲着重任在身之故。工人不願以自身局部利益妨礙國家大事，尤其表示對政策的信守，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誤會。

在抗戰初期將末（按指一九三八年冬到一九三九年——編者註）的上海，由於上海人口驟增至五百餘萬（當時「租界」內人口大增——編者註），百業一時復興起來，資本家盈利空前，但對職工的工資仍繼續着「折扣」，這時工人才向資方提出要求（恢復原有工資），並且絕大部份都經過合法談判交涉手續得到了解決，僅在十分過不下去的時候才實行罷工等。一直到現在，上海的勞資關係並未惡化。關於這一點，很可提供上海資產階級之反省與參考。

丙、相持階段

（一）反抗日寇的鬥爭

抗戰到了相持階段，日寇在上海不僅全部恢復了自己原有的工廠生產，而且還佔用了英美在滬的工廠。那些像樣的中國廠，除了被戰爭破壞的部分外，也大部被日寇強佔。所以，這時上海的工廠幾乎全部被日寇所支配。工人們爲了生活，不得不到這些廠裏去做工。日本法西斯也就成了工人的直接統治者。日寇對工人的壓迫，確實一天天厲害起來了，不僅是無限制的剝削工人，而且在精神上、人格上，甚至在肉體上，加以無情的野獸般的摧殘。

當時日寇對待工人的第一着，就是把全部工人當亡國奴看待，叫工人出入工廠時必須對日本人脫帽鞠躬，並把女工當作獸軍的玩弄物與「慰勞」品。日寇爲着達到他的任意胡爲的目的，往往採取個別摧殘的手段來強迫全體工人就範；他們會借小故叫個別工人跪在工廠門口的地上，頭上頂一盆水，絲毫不准動，一跪就是半天。他們調嬉女工不遂時，就打她們的耳光；如果是在路上，就把她們拖到路旁邊強姦、輪姦，然後再用刺刀亂砍弄死，以避免洩漏「皇軍」的「王道」。

工人怎樣對待日寇呢？對於鞠躬的事是這樣取消了的：工人開始時很不一致，後來他們想了一想計從心來，好吧！索性齊了心，大家一個個的不慌不忙、斯斯文文的向着日本人行鞠躬禮；開始日本人很滿意，笑嘻嘻地一個一個的對工人回着禮，後來發覺這不對，這樣時間浪費太多，有礙生產，而且他的狗腰也快折斷了，故不久即自圓其說：「大家都是自己人，以後不必再鞠躬了。」女工的自衛鬥爭是採取集體走路的辦法，遇見有調嬉事就大家相助，大聲喊叫起來，鬧得日本人不敢動手。如果發現工廠附近有女屍時，就發動大家去看，表示憤恨與同情，並且傳播到各廠去。這樣鬥爭的結果，也減少了獸軍對女工侮辱的事件。

日寇對待工人的第二着，是執行其所謂「糖菓政策」，對一般工人用拉攏的辦法，獎勵生產發糖菓給工人吃，發給粉給女工用等等。其主要目的是爲了便於發現和搜查工人中的活動分子、工人領袖等。捕着後就施以酷刑嚴禁，交憲兵司令部審判或突然失蹤、公開槍斃，樣樣俱全。

工人們也採用着新的方式鬥爭着。這種方式類似「平地一聲雷，無風三尺浪」一樣，即工人中遇到要反抗的事情，大家交換好了意見後，暫時忍住不響，也不推代表不組織團體去向日方交涉。等到某種事情再發生時，如日人打工人時，被打者不是怕難爲情的忍氣吞聲，而是大叫特叫起來；此時大家就停止工作，應聲而去「看鬧熱」，看的人還問爲着啥事情？有時工人還故意罵那位被打的工人：「娘那個，我以爲啥事情，打兩下子有什麼關係，何必那樣凶叫，好似被機器切壞了一樣。」有時也鬧着不去，紛紛的說「打得不對格」。結果敵人看到生產受影響，只好減少對工人的無理打罵，日本廠長甚至責罵日本監工不好。

日寇對待工人的第三着又來了。它看到工人是團結的，不容易發現其中的積極分子。於是就採取挑撥離間「以華人制華人」的辦法，唆使中國工頭、流氓壓迫工人，調唆女工，利用熟練工人爲難非熟練工人。尤其是日寇常常借小故而強迫工人互相對打，即張打李的耳光，李打張的耳光，並要使勁打。但是這種手段也行不通，工人們明明看到是敵人所逼迫的，故雖然相互打痛了，也不彼此懷恨；反而使工人更加仇恨日本人。

日寇對待工人的第四着又來了，即把工作時間延長，生產標準提高，使工人更加精疲力竭，沒有些微時間進行抗日活動及文化學習。工人的對策是：工作時間延長，出產品不增加，或數量增加質量變壞，浪費原料及燃料，使敵人開支大而收效小。日本人說：「爲什麼你這樣慢吞吞的工作？」工人則拍拍肚皮：「吃勿飽，做勿動啊！」日本人把上下工時間規定得很嚴格，工人就在工作時間內洗手、小便等等。以前工人放工，顧不得洗手就跑回來，現在有的工人就學起「衛生」來了，把停工的時間提前半個鐘頭，大家洗洗手，擦擦臉再走。

日寇壓迫工人是一步也未放鬆過，而工人對他們的鬥爭也是步步加強着。日寇從來不肯自動給工人增加工資的，工人也不敢公開提出此種要求，因爲曉得他們是不講道理的野獸，不講人情的法西斯，所以就採取着特別的鬥爭方式，取得生活的改善。如對增加工資一事，工人們有時採取着所謂「背米」和「幹雙工」等方式來達到目的。當物價不斷上漲，而工資則長期的原封不動時，工人們商議好了，看到廠方接到軍部的限期訂貨，急着要趕工，工人們就在某天突然一齊的不到工廠去，大家三五五結夥到郊外去背米了。廠方急得亂跳，束手無策，找工頭到處找工人，問問他們爲何不來工作？有什麼要求否？因爲訂貨到期不交，要受戰時法律制裁的。當然工人是找不到的，因爲他們就是不去背米也不蹲在家裏。可是過了一天，大家又照樣的按時上工了。東洋老板才鬆了一口氣，並且裝着喜氣洋洋的樣子問工人爲何昨天不來作工？有什麼要求吧？工人回答說：「沒有什麼要求，我們昨天去背米的。因爲自己背的米要比買來的便宜一

些，如果一天背兩趟的話，所賺的錢還要比所賺的工資多一些。」全體工人都是一樣的回答，日本老板只得說：「好了，以後不要去背米了，從今天起工資一律加一倍。」幹雙工的，即工人在甲廠工作後，又到乙廠作一個工（因技術工人缺乏）。但到第二天回到甲廠工作時，當然疲勞百倍，實際上不能工作的。於是工頭、監工就先罵後問：「儂爲啥這樣沒神氣？娘那個……儂夜裏在幹啥事體？」工人回答說：「阿拉夜裏到乙廠又幹了一個工，阿拉一連幹了雙工，否則一個工無法生活啊！」工頭、監工把這種情形報告給經理，最後也達到了增加工資的目的。

上海工人也曾作過較大規模的合法鬥爭。如有一時期，日寇憲兵經常僱用出差汽車綁票、拉女人到虹口區去；又怕司機工人回來洩露消息，故就地把司機工人弄死。這種事情幾乎每天都發生一次或數次，造成社會不滿與不安。司機工人曾屢次向公司提議，拒絕開往虹口區域。公司一來爲賺錢，二來是怕日人勢力，故對工人的意見拖延不覆。雖後來公司允許發給被難工人殯葬費若干，但工人是爲着反抗日寇此種暴行，爲着從積極方面打擊和制止日寇的野蠻行爲，當然對此不能滿意。於是有一天工人們就抓住一位司機工友又在虹口被殺害的事實，組織了大規模的「送喪」遊行（按此處係指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日上海各出差汽車公司全體工人的抬棺大遊行，參加者萬餘人——編者註）。無數的出差汽車慢慢地在馬路上開行着，好似什麼「大亨」出殯一樣，經過的地方都停止了交通。花圈輓聯到處皆是，上面大書着：「某某工友某日出差到虹口，被惡人所害！」「爲某某工友復仇！」「記住某工友爲誰所殺！」就是這樣的宣布了日寇的罪惡，打擊了日寇的凶殘，社會各界人士莫不稱快。從此這種暴行也就減少了。

（二）對僞工會的鬥爭策略

一九三九年春，汪逆精衛在上海開始了所謂「和平運動」。這批賣國賊奴隸胚子們，企圖弄到一點政治資本，故不惜冒險到工人中大肆活動，組織僞工會，動員了大大小小的「批工賊」、流氓到處稱霸行凶。他們的主子——日本法西斯並給他們劃定了地區，只許在中國廠及前英美廠家以內活動，日本廠則絕對不許染指。這樣也暴露了敵僞的真實面目，他們陰謀一箭雙鵰，一面以工人力量威脅資方，擁護其「和平運動」，投靠僞方勢力；一面在這種行動中發現工人中的組織及積極分子，準備必要時打擊它和一網打盡它。

當時在工人中發生了各種不同的意見，對僞工會的態度究竟應該怎樣才好呢？躲避不參加它吧，又躲不了，因爲這批豺狼會找到工人門上強迫着參加的。那末利用它把工人組織起來，再反對它吧，這樣又恐怕辦不到，因爲它既不是真的來組織工人的，決不會坐看你長成了力量去反對他們。同時資方對僞工會的態度也是不一致的，有的聽到工會的名詞，就像「歇斯的里」病似的怕得不得了，簡單地加以拒絕，並威脅工人不得加入僞工會；有的感到僞工會要利用工人

力量要挾他，故自動向工人討好，希望與工人取得某些諒解，而暗地裏又同敵僞來往，以備自己困難時有個退步。資方雖然希望工人不加入僞工會，但無論如何仍不願承認工人原有組織的合法地位，更不願工人自動組織新的團體去防禦僞工會的來襲。結果工人却慎重的選定了一種辦法，即原則上要加入這個僞工會，但必須集體的加入，大家共進共退，避免僞方分化及各個擊破。僞工會的下層幹部一般的由他們決定也不妨，反正都是工人，工人對工人總是好辦的。正因為大家從下面加入，不僅主動權保存在自己手裏，而且這力量也根本不會被敵僞所利用。對工人有利的東西則要之；不利的東西則羣起而拒絕之，即借種種原因怠工或拖延時間不執行它。對僞工會的上層分子則個別包圍、孤立及打擊之，如是工人分子則爭取之；並利用和擴大僞方內部的矛盾，使他們不能一致行動和共同來對付工人。其次，不許他們以工會名義公開發表各種文告等，否則，工人方面所提出的意見也應同樣的發表。這是對僞工會的鬥爭策略。

我們對資方則採取這樣的辦法：當資方企圖利用僞工會，如收買僞工會上層分子壓迫工人時，即資、僞一致時，工人就越一級的去向僞方社會部表白態度和請願，說明自己對資方的要求，實際上是向漢奸告發漢奸，但不說出口而已。此種要求條件盡量使其簡單與公平，僞社會部長為着自己的「威信」及與僞工會幹部間的矛盾等，就往往很容易贊同工人的要求，這樣就使資方大大不利，出了一筆收買費仍舊要滿足工人的要求。因為資方收買的人，只有收錢之能沒有効勞之力，結果資方就落了空；有時這批傢伙拿到錢就什麼都不管了，資方對之發怨言時，則答稱：「這次是上級答應了工人，下次再補救吧！」這樣不僅利用了僞方上下級的矛盾，而且也局部地擴大了僞方與資方的矛盾。有時資本家直接走上層路線，即不收買僞工會下層分子，而收買其上層分子。那麼我們就包圍糾纏其下層分子，揭發資方的行為，揭發僞方上層分子受賄等情。總之，盡量使僞方上下層互相矛盾，使僞、資之間也不能達到完全的一致。事實上資方走上層路線也是沒有出路的，錢少打不動，化了錢也不能保證不發生問題。因為勞資間的問題，究竟不能到勞資以外去找出路。何況僞工會的下層分子，自己會製造出各種大小是非，鬧得資方應付不暇，不化錢又無法解決問題。還有某些資方根本怕僞方，僞工會成立以後，資方處處恐怕得罪僞方，任意由僞方擺佈，唯命是聽。這樣對工人來說，是非常不利的，資方與僞方統一起來了。為着要主動地改變這種情形，我們就一面把要求條件提到僞工會，要它負責交涉；一面由口頭上向資方提出可以讓步，即降低要求，使他很快地承認，再讓他自己去對付僞工會好了。這樣就使僞工會無法利用工人力量威脅資方而漁利，並使資方知道工人並非依賴僞方力量要挾它，乃是本着抗戰團結顧全大局的精神，爭取自己應得的利益。當然也教訓着這種資方嘗嘗不抵抗敵僞的味。

以上就是我們對僞工會的鬥爭策略。所以僞工會之最後垮台決不是偶然的。它究竟弄到了多少政治資本，只有天曉得！不用說叫工人擁護「和平運動」，就是以任何引誘叫工人到街上參加一次「示威」都是不可能的事；至於到後期他們想叫工人協助敵僞作特務活動，那就比登天還難。因此敵僞只好下令把那些僞工會取消了，否則，它的存在對敵僞

說來是因多吉少的。

講到上海工人對僞工會的鬥爭時，不能不提一法電工人領袖徐阿梅被敵僞殺害的教訓。徐阿梅雖說是上海工人中堅決不屈、善於領導羣衆鬥爭的優秀分子，但他缺乏政治修養及對於鬥爭策略的研究，把握不住抗戰時期對敵僞鬥爭空前複雜的工運條件。他只知道利用敵僞矛盾的原則，而不知道怎樣利用；更不曾考慮到利用人家的矛盾，必須自己有一定的力量作後盾，必須同廣大羣衆一道兒以團結和鬥爭的姿態出現，從鬥爭中、從動的發展中利用其矛盾。徐阿梅是被敵僞千方百計引誘出來的，而阿梅本人企圖利用敵僞的合法力量，再加上自己的威信，從上而下的把英電、法電等市政工人組織起來。他正是中了敵僞調虎離山的奸計。敵僞把他從羣衆中孤立起來，從上面強迫他爲他們的要求而服務，他當然不肯幹；而下面羣衆以爲徐阿梅當了漢奸了，一時還不能瞭解他的本意，故尚未明白表示擁護他。就在此時，敵僞老羞成怒，把他用機器絞死了，把他的身體絞成肉醬冲到陰溝裏去了。（編者按：據本刊第二輯十九頁「法電職工團舉簡史」中稱，徐阿梅同志係於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廿九日被漢奸特務暗殺於市郊中山路上，似較確實，本文所稱「用機器絞死」，可能係傳聞之誤）並且根本就秘而不宣，因爲敵僞害怕宣佈了他的遭遇，說不定工人再來一次規模更大的「送喪」示威。

（三）今天之上海工人

由於日寇七、八年來蹂躪上海的結果，使上海的工業及其原有的生產力完全被破壞了。昔日整天機器嘈雜的工廠區域，今天已變成無聲無息的地帶。往年五、六千人的工廠，今天的關閉了，有的只剩下七、八十人到一、二百人，實際上只是看守着工廠而已，不是爲着生產而是爲着避免日寇藉口「借用」這些工廠。日寇把英國人有名的怡和紗廠、麻袋廠竟全部拆毀搬走，甚至連地底下的水管子也挖出來送到兵工廠去了。許多中國工廠已成殘廢狀態，如好的能用的機器都被日寇搬走了，名義上還說是「借用」的。原料根本沒有保證，燃料電力的供給被限制得幾乎等於取消了。這就造成了全上海工業空前未有的危機。今天的上海工業，具體說來，最主要的部分已被日寇佔有，加以軍事化的管理，專爲軍事生產，所以僅是些軍事工業了，而不是適合人民需要的工業了。日寇把全上海所有的造船廠、修船廠全部歸併到以前的中國江南造船廠；把紗廠則改爲軍服廠及傷兵院等等。

工業毀壞當然影響到工人的流動及數量上的減少。大部工人失業，不得已回鄉了；回鄉不得的被生活所逼而改行做小生意、跑單幫者也不少；至於因疾病而死亡的更日見增加（關於工人生活情形看「一年來上海情況的一般」一文）。上海工人階級就在日本法西斯的浩劫下大大的削弱了。今天據一般統計來看，上海產業工人僅剩下不到二十萬人左右了，約佔戰前四分之一。而這些工人百分之六十以上是在日寇工廠的，如果盟國飛機轟炸起來，工人的數目一定還要減

少。但我們不應單從數目上看上海的工人，而應看到今天上海工人的成份，技術工人是佔多數，文化及政治水平也都比戰前高得很多。他們不僅保存着向來的革命傳統及鬥爭經驗，並且還有七、八年來與日寇直接鬥爭的新的鍛鍊和經驗。他們雖然還沒有正式的全面的像工會等組織，但其相互間的親密與團結已非昔比。其次上海工人不是孤立的，他們不僅在廣大的市民中保持着一定的影響，而且還有廣大的可靠的同盟軍手工業者，更不要說在上海外面還有自己強大的軍隊——新四軍作後盾。今天上海工人的生活狀況雖然已達空前惡化，但他們的毅力勇氣始終奮發着。他們對日寇的仇恨日夜的增加着，對日寇反攻的決心和信心堅持而鞏固。他們也痛恨大後方國民黨的頑固不進步，不積極的抗戰而始終消極的應戰，毫無遠見和計劃——反共反人民則神氣活現，抗戰則好似失掉靈魂似的一退再退。轉移到後方的工廠，全被國民黨弄糟了。今天轉移明天轉移的結果：時間浪費了，機器損壞了，再加上獨裁的統治，官僚的壟斷，還生什麼產呢？如果上海工人知道他們的同伴至今還在後方失業流浪，無人關心，如新華日報九月四日所載的桂林消息，一個技術工人很憤慨的說：「我們有的不只是技術，且有滿腔熱情和一身的能力，可是沒有給我們用力的地方，到處的大門都緊緊地關閉着，不讓我們進去……」那末會怎樣的痛恨國民黨呢？

在另一方面，上海工人又經常被另一種事實所鼓勵和安慰着，這就是他們曉得共產黨領導下的各抗日民主根據地，完全是新天地。新中國的模型——陝甘甯邊區的工業蒸蒸日上，從工業毫無基礎發展到工業品已能半自給的程度。工人的數目大大增加了，六年之間就增加了將近廿倍。那兒的工人不僅物質生活得到很好的改善，而且在政治權利上得到了充分的保障，可以自由的組織工會，工人間不管男女老少，熟練工與學徒，都萬眾一心的團結在一起。生產模範者可升到勞動英雄，博得社會及政府的讚譽與獎勵。那兒工人們開會，不僅沒有上海與大後方那種不自由的現象，而且公開的奏着音樂開的。每個工人工作與學習都是十分愉快的。

總之一句話，今天上海工人一面是遭着日寇及其走狗特務的極端壓迫和威脅，過着提心吊胆的受饑挨凍的地獄生活；另一面却懷着極大的希望，希望日寇趕快失敗，獲得解放與自由。他們相信天快要亮了，他們正在繼續努力，準備配合新四軍收復大上海。

丁、如何準備總反攻

黨在今年「七七」紀念時，對淪陷區的同胞提出了如下的口號：「淪陷區的同胞們！你們解放的時刻迫近了，繼續各種形式的大小鬥爭反抗日寇佔領者。聚集力量，加強準備，準備在必要時以武裝起義來響應將來的全國總反攻。」這對於上海工人是適合時宜的戰鬥口號，也是他們為準備取得將來的勝利而努力行動綱領。我們相信上海工人對於黨的

號召和自己所負的光榮任務，是一定會拿事實作回答的，這是不成問題的。但爲着使這個任務完成得快而好，我們必須注意以下各點：

一、我們應當首先在工人中，來個思想總動員。要在工人內部說通道理，使每一個人都能深刻的了解武裝起義與裏應外合的實質和意義；教育工人怎樣在行動上學會具體的起着「裏應」的作用；告訴工人們這是抗戰七、八年來努力奮鬥爭取最後勝利的決定意義的一個動作，要拿起武器來夾擊敵人，驅逐和消滅敵人出上海。同時要說明今天我們準備的武裝起義，決不是盲目的、無根據的企圖，乃是有國內外順利條件、敵我力量的具體變化與對比爲根據的。我們有歷史上空前未有的優越形勢，現在只須我們主觀上的努力，把主觀的作用提高一步，提到客觀需要的水平上。一句話，需要一個切實的具體的準備工作，並且須在一定時間內完成這個準備工作。

二、我們在工人中須要來一個極大的複雜的組織工作，「聚集力量」的工作，使大家進一步的結實的團結起來。要把所有零星的力量（包括在業與失業的，改了行的工人但仍住在一個區域的），經過精細的巧妙的組織工作，表面上是無形式的，而實際上則形成一個統一的雄厚力量。要把所有工人都有條不紊的團結在各式各樣的大小小的積極分子的周圍，團結在他們平日所認識的、所相信的人們周圍，造成一舉百動的步調整齊的隊伍。在這準備時期，可經過一定的大小形式的鬥爭，去檢閱這種組織工作的真實與藝術。我們應該以最高的組織力量，以無產階級的戰鬥品質去影響全局，保證在武裝起義時的骨幹與核心作用。

三、我們應說服上海工人，善於爭取自己的同盟軍，並學會發揮同盟軍的作用。我們要盡最大的努力，把廣大的手工業者、工廠職員以及工頭「拿摩溫」，甚至工廠區域的流氓，爭取和團結到自己的周圍，作爲自己直接的同盟軍。要靈活的掌握和團結各種各樣的、甚至各自企圖不一的自發力量。只要我們抓住它抗日的這一個共同點，甚至抓住它動的那點事實，去運用和發揮這種間接的同盟軍的效力。爭取敵警偽軍的反正，也是非常重要而有效的工作。

四、我們要同上海工人一道兒去認真的研究一九二七年三次大暴動的經驗與教訓，同時研究今天的武裝起義的巷戰戰術等問題。如果抗戰初期敵人是進攻我們的，工人首先退出敵人的工廠是對的、對我有利的行動；那末今天敵人是被打的，逃跑的，我們若不犯教條主義的話，那末就應考慮：如果佔領工廠機關，是否會更加削弱敵人的陣地？如果把工廠機關變成起義的堡壘，變成巷戰有力的現成陣地，變成無數的小的局部裏應外合的據點，這樣是否對我會更有利些？再在這個基礎上擴大我們面的佔領，同外合的新四軍戰士握手，地域與地域再連接起來，是否更較便利？……諸如此類的問題。

五、我們同上海工人應有更高的警覺性，尤其在這行動的前夜更加重要。我們不僅要善於聚集自己的力量，而且要善於保存及合理的使用它。我們要極緊張的準備裏應外合的真實力量，同時我們也要注意不洩露秘密及不浪費自己的力量。

量。

我們要提醒上海工人，特別應注意那些頑固分子，現在他們正在到處活動企圖反對我們。他們與反法西斯的人民相對立，想步波蘭流亡政府的後塵，想在上海重演華沙的把戲，這些反動的無惡不作的陰謀家，好事不成，壞事有餘。據說這些反革命分子正在那裏計劃以特工偽軍為主，結合流氓勢力，另外還希望偽軍警的歸隊相配合，組織一個過早的暴動。他們認為上海無論如何不能讓反法西斯人民來收復，他們甯肯幹出打不着鹿也不准鹿吃草的勾當。即是說，他們的暴動萬一僥倖成功了，則可報功獲利，並變成上海人民的統治者；如果不成功，就借日寇的刀把參加暴動的進步分子殺死。所以我們在今天要特別慎重行事，要幫助工人認清敵友，不要上當。要使工人認識：只有共產黨領導之下的武裝起義，才有勝利的保證。要把反革命分子的陰謀巧妙的揭露出來，使上海各階層人士注意不上他們的當。

六、注意羣衆工作的民主方式及對敵鬥爭的合法方式：

我們對羣衆的教育說服以及組織團結，都應採取最廣泛的民主作風。民主方式不僅可以接近與團結進步的羣衆，而且還可以深入最下層的基本羣衆。民主方式是羣衆工作成功的命脈。我們一定要學會與人爲善的美德，論事不論人的整風精神，耐心地同羣衆打成一片，爭取羣衆的大多數，適當的把羣衆提高一步，領導羣衆同時並向羣衆學習。

對敵僞鬥爭的方式，不管是經濟的、文化的或者政治性的鬥爭，主要的當然還是採取合法的方式，尤其應當重視羣衆所創造的各種新的合法鬥爭方式。過去幾年來對敵僞鬥爭的那些方式，在開始時大部分是羣衆中自發的甚至是偶然的創作，但經過我們略加整理以後，便變成了最適宜最有效的鬥爭方式。我們要高度發揮利用敵僞合法的藝術，以麻痹敵人，團結羣衆。

目前我們的緊急任務，是從羣衆日常大大小小的生活鬥爭中，來切實地聯繫起廣大羣衆的力量。一切的一切都應該是爲着準備武裝起義的雄厚力量而奮鬥。

十月二十日

店員與職員運動

張承宗

——一九四四年十月發表於華東局城工部編「城工資料」第四期

一、職員的基本特點

敵佔區大城市有着很廣大數目的職員，單以上海一地來說，就有三、四十萬人，這些職員分佈在中外的工廠商店裏，偽方的國家機關和文化機關裏。他們是以依靠出賣腦力勞動或技藝而生活的人，是不剝削別人的，通常都稱為薪水階層。他們是社會經濟建設和城市管理中的不可缺少的部份，更由於他們在職業生活和社會實踐中，親身體驗了日本帝國主義、大資產階級和封建勢力各種各樣的壓迫，因此他們是無產階級可靠的同盟軍，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重要力量。

在歷史上，「五卅」時期的大罷市，大革命時代的店員運動，一部份店員、職員與工人一起，以武裝起義來光復上海，都留下了輝煌的業績。「九一八」以後，中國經濟恐慌加深，工商業紛紛倒閉或裁員，職員的失業威脅更增大了，因此也提高了他們參加革命的積極性。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抗戰，在我黨領導下成立了上海各界民衆反日救國會，並組織了抗日義勇軍，很多職員參加了，並與工人並肩的在前綫作戰，用人民的力量來支持十九路軍抗戰，但由於當時國民黨政府的投降政策，終於簽定了淞滬停戰協定，出賣了抗戰，而在反動統治者的壓迫之下，職員的抗日團體也被誣為「非法」組織，只能從事於秘密的救國活動。一九三四年三月，上海三十萬市民送抗日烈士潘洪生出殯大示威，有很多職員參加。一九三五年救亡運動高漲，大批的職員參加，成立了上海職業界救國會，在宣傳抗日統一戰線政策，反對賣國賊，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同時並進行了下層青年職員的組織，如讀書會、研究會、歌詠團、俱樂部等，成為以後職員抗日運動進一步發展的基礎。抗戰以後，尤其是日寇直接佔領租界以後，英美產業被沒收，民族企業受併吞或嚴格管理，職員更遭受了嚴重的壓迫，加以物價狂漲，生活日益貧困，因而在思想上、政治上傾向革